

# *The Reach of the State* 摘要

Shue, Vivienne. (1988). *The Reach of the State: 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摘要翻译自本书的“Introduction”部分。翻译借助Kimi AI，并进行人工核验。个别因故无法翻译的段落使用DeepL翻译。

---

这些是实验性的文章。它们关注的是更为批判性和概念性的问题，而不是实证性的。它们是不完美的成果，是我在过去几年中断断续续寻找一种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方法的过程中产生的。这种方法既要足够严谨，以便于我们能够小心地实践；又要足够灵活，以包含我们最近所见证的所有变化和流动的证据。

这些文章本质上是关于如何思考中国国家的问题：关于其复杂的结构、角色和能力；关于它与中国社会整体的关系，特别是与农村社会组织的关系；尤其是关于其演变过程，我们不仅能在其形式和功能上，还能在其最根本的精神上识别出的变革模式。尽管这些文章在执行上可能存在不确定性，但努力同时发展更精细、更动态的思考方式，最初源于对现有研究中国政体的模型和方法的持续不满。如果说到了20世纪80年代，毛主义的“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语言显得空洞，那么西方仍然广泛坚持的内部精英权力斗争模型也同样如此。尽管东欧的修正主义理论家在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方面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可以教给我们，但他们的政府困境在社会形态上与中国如此不同，以至于真正的类比、教训和比较，遗憾的是，非常稀缺。我自己的所有早期实证调查都让我对农村中国的政治有了一定的了解，使得所涉及的过程看起来比现有的中国国家、社会和政治模型能够舒适容纳的要复杂得多、多面得多、微妙和多变得多，充满了失败和挫折、低效和误判、半真半假和双关语。因此，目标是找到一种思考中国政体的方式和研究方法，将过程的解释置于工作的核心，同时留有足够的空间，对那些推动和拉动的力量进行仔细的检查，这些力量是研究过程中所嵌入和出现的复杂刺绣。

然而，从一开始就可以坦白承认，尽管这些更高尚的理论目标和方法论目标并不总是清晰可见，但当这四篇文章最初被塑造成形时，它们并不是始终被牢牢把握的。每篇文章都是以更谦逊和有限的直接目的构思的。而且，进一步指出，这些文章的核心都建立在一个借用的概念……和一个直觉之上，这对这些作品来说并无不公。

我的直觉是，许多看似特殊的复杂性和不寻常的综合症，这些特征使得中国社会主义的经验偏离了各种模型中所设定的清晰线条，必定与农民社会基础的广阔性有关，与农民在政体整体构成中的庞大重量有关。因此，我将我的工作重点放在农村政治的动态上，以及农民在不断演变的社会主义政体中变化的位置。

借用的概念是有点地理学意味的观念，即一个分割的次级结构，一个“细胞”模式，特征化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组织。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如果我们想要描绘中国农村社会、经济或政治生活的骨架，我们可能会制作出一个巨大的蜂窝状图，由许多小的、相似的、相连但又或多或少完全有界的细胞组成，这些细胞主要是内向型的活动。这种细胞状结构的持续性，这种在农民生活、工作和参与公共生活的社区中明显的有界性和离散性的质量，在社会主义革命三十年后仍然存在，看起来非常引人注目。它似乎，也很可能是分析中国国家-社会关系和政治模式的一个关键要素。

当然，是G. William Skinner关于传统中国市场系统的重要早期工作首次提出了农村边缘地区组织细胞模式的观点。但Skinner利用这一洞见强调的并不是他所描绘的农村细胞的离散性，而是它们通过商业和社会交往连接成相当广泛的网络的手段，这些网络在革命前的城市和农村社会经济之间带来了超过一定程度的整合。

Audrey Donnithorne后来重新提出了细胞性（cellularity）的概念，以描述她所看到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央和省级党政官僚机构的攻击之后中国经济的相对分裂。但Nicholas Lardy，他一直在密切研究文化大革命之前的经济组织和管理，发现在1950年代并没有根深蒂固的细胞性的证据，相反，他强调了那个时代中央国家对计划和财政的相对高度集中控制。如果Donnithorne和Lardy都是正确的，那么显然已经发生了变化——可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结构向更大细胞性的倾向有所加强。

无论如何，存在一种潜在的模式或趋势，即在农民经济和社会次级结构中固有的某种细胞性，这种细胞性在不同情况下可能变得更加或不那么显著，这似乎值得追求。它值得追求，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在经济学和经济人类学中有趣的研究，还因为它的政治影响——它可能告诉我们关于中国政体变化形态的信息。这四篇文章无论如何都是为持续的理论实证追求而进行的开路工作。

第一篇文章最初是受到西方新闻和学术界最近重新兴起的极权主义形象的启发，用以描述毛泽东时期的中国政体。就在我们认为“极权模型”终于被送入了拥挤的智力历史垃圾箱时，中国和西方的分析家们开始（显然很认真地）将1970年代的极左主义称为“法西斯独裁”，并将文化大革命本身称为“恐怖的大屠杀”。在反对这种悲哀的倒退回早期简单主义的同时，文章还记录了西方社会科学家在过去三十年对中国政治研究中取得的一些进展，一些概念上的距离。一些更复杂的方法被简要考虑，评估了它们的贡献，并批评了它们的不足。文章最后推荐了一种我们所有人都可以考虑在当前中国政体研究中追求的一般方法和方法。这种方法将过程分析置于研究工作的中心，并追踪政体中通常被二元化为“国家与社会”、“结构与文化”等抽象概念的元素之间的相互制约互动。我将这种方法称为中国政治的社会交织研究，并提出了一种与之相伴随的研究和写作方法，这种方法涉及分析者不断地将最复杂的当地细节与最广泛的可辨识社会趋势和模式并置。这只是强调在我们的工作中政治演变同时沿着许多不同的维度和不同速度发生的一种可能方式。剩下的三篇文章以不同的成功程度来说明和阐述这种一般方法。

第二篇文章初步勾勒了我们观察和衡量政治演变过程的几个不同维度。文章采用了一些中心-边缘方法的外衣，并使用了社会整合理论的语言，以便与“现代化”理论的顺序假设和模式进行某些对比（仅针对中国的情况）。文章提出了一个论点，或者更准确地说，一个供实证调查的假设），即在毛泽东时期，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渗透和控制比学者或毛泽东的政治朋友和

敌人通常想象的更不平衡，也更不彻底。在我看来，这篇文章并没有成功地克服对问题的某种静态定位。但它确实澄清和阐述了农民边缘的细胞性或包裹化（parcelization）概念，并进一步提出了为什么在国家结构和乡村社会的生动交汇点上工作的地方干部的角色和行为可能值得特别关注。它不仅强调了党和国家在毛泽东时期渗透和影响农村社会生活的方式，还强调了农民社会在当代中国国家组织和常规中留下印记的方式，从而指向对国家和社会要素之间可能不断发生的相互制约的互动的更动态的理解。

第三篇文章采用了一种非常不同的方法，以进一步探讨农村地方干部在毛泽东时代调解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所扮演的许多关键角色。它采取了历史和比较的长远视角，以对比西方的国家建设模式和国家与社会互动模式与帝国中国的模式。然后，它比较了中国传统的方士绅和后来的地方精英——革命后农村干部的一些社会和政治角色。这篇文章再次推测了农村社会经济组织分割模式持续存在的原因及其政治后果，将这种模式与对毛泽东时代国家日常触及农民边缘地带的实际限制的认识联系起来。这提供了一个相当不寻常的视角，用以评估后毛泽东时代农村改革的全部意义及其对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进程的影响，随着“现代化”目标的追求。与大多数分析家不同，他们倾向于将邓小平时代的改革视为本质上削弱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力和渗透的努力，我在这里提出，改革的合理化推动，当与有意识地抹去或超越“落后”的农民经济和社会的旧细胞性的努力结合起来时，最终可能服务于国家加强，甚至是国家主义的目的。

这篇文章展示了上述方法，即并置精细的地方知识和细节与我们能够在历史中感知到的最广泛趋势和宏伟设计。这一章节的比较历史方法确实比前一篇文章的中心-边缘或社会整合语言提供了更广泛和丰富的解释范围。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但它并没有完全摆脱静态立场。归根结底，这里的方法更像是跨时间的快照比较，而不是对过程本身的真正研究。

最后一篇文章概述了如何对中国不断演变的政体的社会内涵进行真正的研究。所考虑的时间段大大缩小，仅涵盖革命后的发展。在这一叙事草图中，“国家”与“社会”、“结构”与“文化”、“细枝末节”与“宏大设计”等元素被反复并置，以帮助解释和说明毛泽东领导下逐渐加强的政体包裹化。这一根本性结构演变的意义在于它对国家在农村的能力和所施加的限制，而与此同时，随着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政治运动，民众的社会理想和干部的行为规范也发生了变化，从而进一步阐明了这一演变的意义。所有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揭示了一系列共同的妥协和权力分化模式，它们共同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削弱了其在农村的效力。在毛泽东的最后岁月里，党和国家中央所高调宣称的权力与它所确定的权力往往相去甚远。蜂窝状的政体可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但也非常臃肿，而且并不总能顺应中央的指示。因此，后毛泽东时代仍未完成的农村改革再次被置于一个具有深刻讽刺意味的视角中。鉴于毛泽东逝世前政体中权威的腐蚀和权力的分散，邓小平联盟的结构改革和替代性社会理想的作用可能与其说是削弱，不如说是重新包装和提高政府的权威和效率，即使有人声称其意图是缩短国家的贪婪范围并放松对农民的控制。